



下班途中遇山体滑坡致颅脑损伤 女职工意外受伤是否应认定为工伤

■记者冯伟祥

建德一女职工骑电动车下班途中,因遭遇山体滑坡导致颅脑受伤,目前,这名女职工申请工伤认定受阻。

此案引申出的问题是: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以外的伤害,如遭遇自然灾害等,是否应认定为工伤?

飞来横祸:女职工下班途中因山体滑坡导致颅脑损伤

这名遭遇飞来横祸的女职工叫过晓珍,去年4月17日,她与杭州新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新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之后,过晓珍被新新公司派遣至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建德分公司(以下简称农夫山泉建德分公司)工作。

据过晓珍回忆,今年7月5日晚8时10分许,她骑电动自

行车下班,当时天下着雨,她穿着雨衣,戴着头盔,骑行到事发地点时,头部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很快什么也不知道了。

事故发生后,过晓珍的同事发现她趴在山体滑坡的碎石堆中,电动自行车倒在一边,就向公司值班干部报告。随后,过晓珍被送往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当晚11时许,她被该院脑外科收住入院,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到7月8日才清醒。

8月19日,记者来到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采访。主任医师郑绍俭告诉记者,过晓珍的病情诊断为脑挫裂伤、颅底骨折、眼眶骨折、眼球挫伤、肺挫伤、多处软组织挫伤以及外伤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还需进一步康复治疗。

但8月22日过晓珍就从医院出院了。“家庭条件本来就不

好,为了给老婆治病,借了不少债务,只好提前出院了。”问及原因,她的老公徐土根如是说。他还告诉记者,除了事发当晚农夫山泉建德分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把过晓珍送到医院外,无论是新新公司还是农夫山泉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到医院探望过一次。“这让我们感到心寒”。

记者了解到,事发当天下午事发地就已经发生过一次山体滑坡,从山上滚下来大大小小的石头占据了半条道路,至事发时一直没有清理。

工伤认定受阻:人社局表示因没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止工伤认定

对于这起事故,建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只出具了一纸证明。

今年7月22日,新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向建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同日,建德市人社局予以受理。

然而,7月30日,建德市人社局作出了通知书,表示对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需向我局提交《建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事故责任)”,为此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中止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显然,建德市人社局认为要以建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工伤的依据。

那么,当地交警部门有何说法呢?

记者来到建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了解情况。处理这起事故的中队指导员钟巍华告诉记者,这是自然灾害引起的道路意外事故,不是交警管的,因此不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只能出具事故发生证明。他还表示,这件事认定不了工伤。这是一起道路意外事故,因此不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观点: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以外的伤害,是否应按工伤对待?

这名女职工的遭遇引起了工会组织的关注。

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长期从事工会维权工作的遂昌县总工会经济保障部部长叶铨和认为,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过晓珍下班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在必经的线路、合理的时间内,由于山体滑坡发生的故事是道路交通意外事故,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范畴,且其本人无过错,没有任何责任,因此,应当认定为工伤。

叶铨和表示,至于发生山体滑坡及因此造成公路上碎石堆成了路障,具体责任属于哪个部

门,有待有关部门确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七项同时规定:职工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也应当认定为工伤。

“法律不可能把所有情形都罗列进去。”叶铨和表示,职工上下班途中遇到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而受伤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记者在进一步采访中获悉,叶铨和的观点在一些外省市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支持。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处理的参考意见》明确:“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以外的伤害,如受到歹徒袭击、遭遇自然灾害、制止他人犯罪等,只要不是由于劳动者的故意造成的,应按工伤对待。”《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行政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则规定:“职工在上班或下班的合理路线与合理时间中受到事故伤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徐土根认为,他的妻子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而且她本人没有任何过错,应当认定为工伤。事发至今,他一直在到处奔波讨说法。

对此,本报将予以跟踪报道。

潜规则让8名白衣天使沾污点 ——永嘉查处医疗器械采购腐败案纪实

■通讯员滕理忠、胡静
记者冯伟祥

长袖善舞,套取好感

在这次被查办的所有卫生系统涉案人员中,每一个案件的审查报告里都有易海涛的名字。那么,易海涛究竟何许人也?她缘何能如此长袖善舞?

在采访时,易海涛告诉我们:她早年毕业于温州卫校,从事临床医学专业,面对各类医药代表,看到他们可观的收买与自己微薄工资相比,心里不平衡。易海涛在几番内心挣扎后,决定下海经商。

辞职后,易海涛除了宣传她代理的产品较好外,更是打出感情牌。为能够接近永嘉县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为取得分管采购工作的副局长邵永呈的信任,易海涛很费了一番心思。她知道,邵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仍然把握着一个领导干部的原则和底线。在与易海涛熟悉后,邵永呈对易海涛提出的一些不违反原则的事情给予帮助外,在医疗器械采购业务上没有给她更多的帮助,这对她来说是今后拓展更多医疗器械业务的一个障碍。为处理好与邵永呈的关系,她特地对邵的工作经历进行打探。当她了解到邵曾经在永嘉县民政局工作过时,特意找到能说上话的熟人向邵永呈推荐自己。此后,她到邵的办公室才敢时不时地给他送条皮带、领带或衬衣等小件物品,以此取得邵的认可和好感。

她对其他的卫生院领导也是同样的手段。在熟人介绍后,她在拜访基层卫生院的有关业务中,从不会让人

国家发改委两官员在杭州被公诉

本报讯 记者冯伟祥报道 日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信用处原处长苏崇波以涉嫌受贿罪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与此同时,上城区检察院还决定,依法对国家发改

委财政金融司证券处原副调研员魏星以涉嫌受贿罪向上城区法院提起公诉。

2014年6月,时任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证券处处长苏崇波在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改革报》上撰文,谈“改革优化工作程序监督制约权力运行”,提

出如何完善政策措施,增强政策透明度,“将企业债券工作由过去通常所说的权力工作变成一项普通公文工作”,“除有密级或涉及敏感事项文件以外,所有文件办理过程向全委同志公开”,并以“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作为文章的结尾。

感觉到她是一位医疗器械设备的供应商,而是一个老朋友间互相走访一样随意,使这些掌握医疗器械设备采购的主导权者,都对她的人品予以认同,这也成为她以后能在医疗器械采购领域从容自如得到采购信息、拿到订单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潜规则的“诚信”使他们得以长期“合作”

在医疗器械采购领域,对负责采购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贿赂,被一些人认为是这一行业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从事这个领域业务的易海涛,更是遵守这个潜规则。在每次采购前,她会到各业主单位去逐个走访,并将自己的承诺以暗示的方式告知对方:在医疗器械设备采购成功后,会将好处费送上。她的这个做法使得双方在操作采购中默契地实现。

原永嘉县妇幼保健院业务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潘方平供述:“我在任乌牛街道卫生院院长时,她得知我们卫生院要采购一台彩超,极

力向我推荐她们的产品,并表示事后会对我表示感谢。”最终,潘方平代表乌牛街道卫生院和易海涛所在公司签订了采购协议。在相关的仪器到到位后没几天,易海涛就到潘方平的办公室送来8万元现金。一开始,潘方平是拒绝的,但几度推却下来就默默收下了。

此后,潘方平继续和易海涛“合作”,每次事成,他都欣然接受此种“回馈”,累计受贿14.1万元。

经过多年的人脉经营和“诚信合作”,易海涛在医疗器械代理成功后都会按照事先约定,从中标额中提取不同的利润作为这些领导的“帮助”、“支持”的感谢。每次事成之后,她以重金回馈对方。

易海涛的关系深深渗透到永嘉县医疗设备采购流程各个环节,正是由于易海涛的“守信”,其所代理的医疗器械,每次均能在招投标中中标。

将由医疗器械的销售“明星”而渐然黯淡。

面对诱惑,他们的拒绝不再坚决了

涉案的8名卫生系统领导干部均表示,自己在面对第一次行贿时是坚决拒绝的,但面对行贿人持之以恒的金钱攻势,放松了警惕。

这种思想转变是恐怖性的,在到案后的悔过书上,多人提及是因为受医疗器械行业潜规则的影响,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警惕。在他们看来,为医疗器械供应商提供便利后,收受一定的好处费早已成为行业里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

在面对行贿人的金钱攻势下,不少人拒腐防变的意识不断减弱,逐渐从被动收受向坦然接受转变。在查处的8名卫生系统工作人员中,部分人还转变成主动索取行贿人钱物,包括要求行贿人报销私人发票、以借为名索贿等行为。

目前,该系列窝串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意识流

跪拜领导 是文化沦陷

■阮向民

据媒体报道,9月10日上午,有网友发微博称,沈阳铁西建设大路爱工街凯旋门小广场,一家火锅店的员工在广场上集体跪拜领导,并高喊“感谢某总,给我工作!”伴随微博一起发送的还有4张图片,图片显示多名身穿红色衣服、黑色裤子的男女,在身穿白色衬衫黑色裤子的人面前跪成一排。记者调查核实确有其事,但火锅店负责人回应称,这是展示员工跪敬父母的环节,“属于我们企业文化中的感恩文化”。

我们姑且把文化这件事放一放,先来将一将那不对称的信息:网友微博中说,员工跪拜的是企业领导,并高喊口号“感谢某总,给我工作!”而这家火锅店的负责人则称,员工跪敬的是父母而不是企业领导。显然,两者间必然有一方出了问题。

对于火锅店负责人的这番回应,至少有这么几个疑点无法自圆其说。其一,仪式现场,并未见到员工父母,员工的跪拜礼居然没有主体对象,这怎么解释?其二,既然是跪拜父母,那口中高喊的当是养育之情,而不是现场听到的“工作之恩”;其三,既然是跪拜父母的集体仪式,为何下跪的只见员工不见领导,难道领导没有父母,或者说领导的感恩之心已经不需要用跪拜来检验了?由此,要从这看似不对称的信息中厘清真伪,其实是心照不宣的。

回到文化这个话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跪天

跪地跪父母这一说。在企业文化中渗透感恩文化,也确实是一种值得褒奖的探索,即使真如火锅店负责人所言,跪拜礼是出于感恩文化的设计,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员工行三跪九叩之礼,就不得不面临公众的追问。首先,感恩文化是否通过这一跪一拜就能实现?孝道讲求的是内化于心,也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其二,员工集体下跪,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吗?企业是否尊重了每名员工的真实意愿,如果一家企业的领导们尚没学会对员工最起码的人格尊重,谈企业文化是否有点奢侈?

厘清了那看似不对称的信息,以及对于所谓企业文化的回应,我们对这一跪拜事件大致就有了一个解读的脉络:员工行集体跪拜大礼,感的是“领导给我饭碗”的恩,跪的是权力,拜的是专治。可笑的是,企业领导们居然还用文化来装点内心的霸道和蛮横。这不是文化的复兴,而是文化的沦陷。

用所谓的企业文化将员工捆倒在地,并非沈阳这家火锅店的独创。劳烦一下“度娘”,在哈尔滨,在大连,在重庆,在佛山,类似的场景一再上演。跪拜,这一看起来心悅诚服的极致举动,真能让员工学会感恩,真能给企业带来凝聚力?恐怕有些异想天开了。没有尊重,哪来信任?这浅显不过的道理,在员工一次次用脚投票中,早就得到了最生动的印证。用牺牲员工人格为代价的跪拜之礼,同样在消耗着企业的人格。